

BEITIXUE DAOLUN

碑帖学导论

刘天琪 编著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BEIJIEXUE DAOJUN

碑帖学导论

刘天琪 编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碑帖学导论 / 刘天琪编著. —西安 :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368-2632-8

I. ①碑… II. ①刘… III. ①碑帖—研究—中国
IV. ①J2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6049号

碑帖学导论

刘天琪 编著

陕西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人：李晓明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煤航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印刷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8.75印张 150千字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

ISBN 978-7-5368-2632-8

定价：48.00元

地址：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邮编：710003

<http://www.mscbs.cn>

发行电话：029-87262491 传真：029-87265112

版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引 论	1
第一章 碑帖概论	3
第一节 碑的起源	5
第二节 碑的形制	8
第三节 帖的起源	13
第二章 石刻文字	19
第一节 摩崖与碣	21
第二节 墓碑 功德碑 纪事碑 文献碑	29
第三节 墓志 塔铭	35
第四节 造像题记 经幢 墓幢 阙	40
第五节 碑学及相关问题	46
附：中国三大碑林 洛阳龙门石窟 千唐志斋	51
第三章 刻帖与拓本	59
第一节 从《集王圣教序》到《淳化阁帖》	62
第二节 宋代名帖与帖学启蒙	66
第三节 明清刻帖	74
第四节 传拓与拓片 拓本	82
第五节 碑帖收藏与鉴定	85
第四章 经典碑帖选读	89
1. 秦《泰山刻石》	91
2. 东汉《袁安碑》	94
3. 东汉《石门颂》	96
4. 东汉《礼器碑》	101
5. 北魏《崔敬邕墓志》	107
6. 唐怀仁《集王圣教序》	111
7. 唐 颜真卿《争座位帖》	120
8. 宋 米芾《方圆庵记》	126
9. 三国魏 钟繇《荐季直表》	130
参考书目	134
后 记	135

引 论

汉字是承载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载体。铭刻金石，传之永久，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观念与风气。墨子云：“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有，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墨子·明鬼下》）因而，举凡炎黄五千年来甲骨、青铜、碑版、简帛、纸素等诸多文字载体，无不以承载悠久文明历史而骄傲。然纸寿亦不过千年，即使不易湮灭之金石所存世者亦经战乱火焚而十不存之，故片金片石、断碑残刻既可观文化之演进，又可观书法文字之流变。所以，作为承载文化历史与书法文字重要载体的碑与帖，一直受到极大的关注，无论是从器物学的角度还是从金石学的角度来考察，都有悠久的历史。如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时，所收籀篆古文，多自金石文字，故有“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之说。延至宋代，金石学大兴，访古、著录、摹图、考证，一时之盛。“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或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吕大临《考古图记》）近现代，随着西方考古学的引入，使得甲骨文字、简帛书、敦煌文献等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而独立。从目前的学科属性来看，古代石刻及其所拓文字、图像等，一直作为考古学、金石学、文字学等学科的附属，近年来又列为美术考古学（或艺术考古学）的附庸，并未能上升到独立的一门学科。

帖

我国金石学研究的兴起，以宋欧阳修著《集古录》、赵明诚著《金石录》流传天下为滥觞，其后历代皆有学人绪之，至有清一代金石碑版考证大兴，乾嘉学派以“据史传以考遗刻，复以遗刻还正史传”（王国维语）为著录考订根本，诚开近代学术之先河。所谓金石学，是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风格；上自经史考订，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而“石”者，朱剑心定义为“以碑碣墓志为大宗，旁及摩崖、造像、经幢、柱础、石阙等物，凡古石刻之有文字图像者，皆属之。”

（朱剑心《金石学》）因碑志等石刻文字，比纸张简帛更能经历久远而不易腐坏，存其本真而难以磨改，故“一般而论，金石文字的数量不能与纸帛文字相比以少量补充于多量”，但“以原始性较高的金石文考证传抄翻印的书籍，乃是学界求全求真的治学办法。”（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总序）所

以，从现代学科建设及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对古代石刻的形制演进、书体变迁、制作工艺及所蕴含的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书法史学、美术学、文学等知识，及民俗学、民族学、人类文化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察研究，是目前学界的重要学术范畴，也是本书编著的基础。

作为古代石刻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碑志与刻帖，拓片与拓本，千百年来不仅承载着华夏文明的有绪传承，同时也承载着文字演进、美术图式变迁，更重要的是，这些先民遗留下来的石刻，是研究古代文化、思想、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天文、地理等的最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从目前碑帖的学术研究看，主要集中在编目整理、文字释读、文史研究、书体演进、书法艺术、美术纹饰、鉴藏辨伪等诸多方面，其范围之广，远超前人。但从学科角度看，大都没有体现学科意识，仅仅以碑帖之相关内容研究作为某类某科学术研究的有益补充，故希望以此《碑帖学导论》为契机，呼吁更多的学者关注碑帖学的学科建设问题。

从本书的编著意图看，作者虽力图倡导“碑帖学”学科，但为适应一般的本科生、研究生读书需要，更限于作者的学识，目前只能仍然遵从一般意义概要性质上的碑帖简介，其“学”的内容相对缺乏，这也是作者和有识之士日后共同努力的填补的空白。因此，本书在前人及今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对碑帖所涉及一般性问题作简要梳理，以供读者参考。其主要内容包括碑帖的来源、形制；摩崖与碣；碑的种类；墓志与塔铭；造像题记；刻帖与拓本；传拓；碑帖收藏及经典碑帖选读等。

【第一章】

碑帖概论

碑的起源

碑的形制

帖的起源



第一节 碑的起源

“碑”是古今最常用的一种石刻形式，虽然形状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文化内涵基本保持未变。关于碑，《说文·石部》云：“碑，竖石也。”表明在东汉时，碑的形制为竖式，石质。考察先秦文献，其实有三种石质物品都称为“碑”：

其一，测日影，为宫中之碑。《仪礼·聘礼》：“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郑玄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影），引阴阳也。”此处的碑其实相当于观测时间的日晷。这种风俗传承很久，目前还有多处古代遗存。

其二，拴系牲口，为庙中之碑。古代宗庙祭祀，牲口是最重要的祭品。故在宗庙前面竖立石桩，上面打孔，以便拴系准备宰杀的牛羊等牺牲（祭祀品）。《礼记·祭义》：“祭之日，君牵牲，穆答君，卿、大夫序从。既入庙门，丽碑。”郑注：“丽，犹系也。”孔疏：“君牵牲入席庙门，系著中庭碑也。王肃云：以紉贯碑中，君从此待之也。”此处用以祭祀的“碑”，又演为在祠庙、衙门、学府等公共场合拴系牲口的石桩。今天所见到的明、清等时代的拴马桩应为其余绪。

其三，便以丧葬下棺槨，后演为坟墓之碑。“碑”的原意是指没有文字的竖木，上面有“穿”

（圆孔），主要用途是作为下葬引棺的辘轳架，起定滑轮作用。

《礼记·檀弓下》云：

“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郑注：“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槨前后四角树之。穿于中间为鹿卢（辘轳）。下棺以绋绕，天子六绋四碑，前后各重鹿卢（辘轳）也。”《太平御览》卷



图1. 陕西凤翔秦公大墓槨室两壁外侧的“木碑”是中国墓葬史上最早的墓碑实物。图中斜竖土中的圆木是仿照考古实物而设置。原物藏秦公大墓陈列室内。



图2. 陕西凤翔秦公大墓椁室两壁外侧的“木碑”实物。虽历千年而未朽，证实了古代文献的记载。

五八九《文部五·碑》：“《释名》曰：‘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其鹿卢，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1986年，在陕西凤翔秦公大墓的墓道中发现了四座无字竖木的巨“碑”实物——当时引棺入墓的辘轳基座（高1.7—2米，直径0.4米的木柱），第一次以实物方式证实了古代的“碑”本是竖立在墓圻周边的大木。也证实了古代棺槨下葬时的一些基本程序：将绊（下棺的绳索）穿过木碑的圆孔，徐徐放下棺柩；若本碑上无孔，则将绊缠绕在木碑上，两碑间再施辘轳，同样起到下棺作用。据载，为诸侯执绊者有五百人，皆牵绊而负引，以击鼓为号，逐节舒纵，将棺柩降入椁内。可以想象当时下棺殡葬的宏大场面。

上述三种情况的“碑”都是为现实生活所需而设。因此，碑的缘起应为实用器物，早期的“碑”并无刻写文字，与后世的碑刻概念也有本质的不同。但有载事、纪功、凭吊等功用的“碑”，其源于用以牵引下葬棺槨的“碑”则无异议。

为什么称为“碑”，而不称为其他呢？古今学者都试图解释，但一直没有较为合理的说法，故直至今日仍在讨论之中。有人提出“碑，所以悲往事也”（《初学记》卷九十八引），认为立碑是为了纪念先人，以表示悲痛。故唐代陆龟蒙在《野庙碑》中云：“碑者，悲也。古者悬而窆用木，后人书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汉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称矣。”（《笠泽丛书》卷四，载《文苑英华》卷八七六）此二说皆为唐代，墓碑、墓志等已为普通的丧葬器物，此时之“碑”，已仅为逝者纪功显德或于庙祠记事，重在祭祀，显然与“碑”的原始



图3.《琅琊台刻石》，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东巡登山东琅琊台封禅石刊立，传为李斯所书，是秦代小篆的代表作。此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移置山东省博物馆。1959年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应该说，纪事铭功的载体从青铜器转为石材，是铭刻文化发展重大转换与必然选择。主要原因是石材取材方便、价格低廉，同时铭刻镌凿容易，形制可大可小，故秦朝以后，刻石蔚然成风，而镂金则逐渐绝迹。刻石又依照铭刻的目的与用途的不同，逐渐分化产生出各种不同外形的石刻类型，其中就出现了具有现代碑帖含义的“碑”，这一石刻

之意已大不相同。

我们认为，具有载事、纪功、凭吊等功用并刻有文字的“碑”，其源于古人在青铜等器物之上刻辞纪功。从考古的实物来看，古人早期纪事大都附载于各种生活器物之上，对于重要的事件，期许可流传久远，故选坚硬材质进行镌刻，最初为陶土或甲骨，其后铸以青铜，而在石材上刻写铭文则相对较晚。目前考古发现的先秦时期刻有文字的石质铭文，其形式都比较简单，只是简单地利用天然的石块或石壁形状进行镌刻，其形式也不固定。因此，古人对先秦石刻并不称为“碑”，而称为“刻石”。如秦始皇巡游天下，曾在泰山、峯山等地封禅刻石纪功，就是现存最早的刻石之一，而这种称呼也一直延续到西汉以后。如《鲁孝王刻石》、《群臣上醺刻石》、《莱子侯刻石》、《襁盗刻石》等。



图4.西汉五凤二年（前56）《鲁孝王刻石》。

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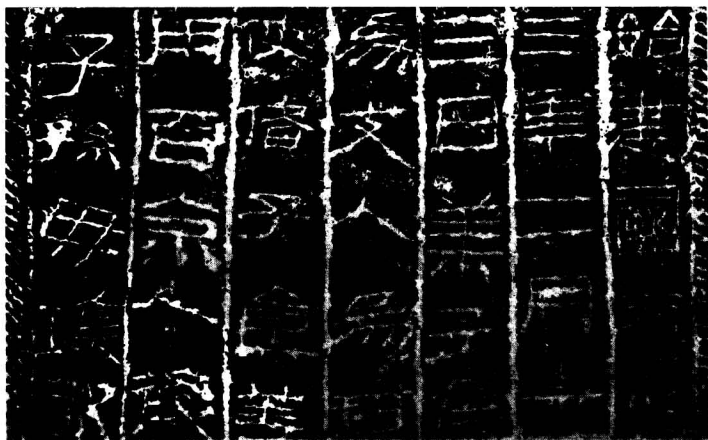


图5.《莱子侯刻石》，新莽天凤三年（16）。

形制在东汉得到了普遍接受并逐渐固定下来，成为后人广泛遵循的碑刻制度。从无文字、无固定形制的原始“竖石”，发展到东汉有一定形制、一定文体的铭刻碑版，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漫长演化过渡

时期，并延续至今未有大的改变。

关于“碑”，其实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碑”是指众多石刻文字中的一种，其铭刻载体必须是经过精心加工磨制的、有一定形制规格的长方形竖石。而广义的“碑”，则是泛指各种类别、形制的石刻文字，如碑碣、摩崖、墓志、石阙、表铭、文告、契券、经幢、造像、题记、建筑构件题名等，“碑”成为一种“泛石刻”的集合名称。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在碑碣、石壁上刻写，雕镌有文字、圆案或者宗教造像等，赋予其文化信息的石质载体谓之碑刻，或称“石刻”。它既包括用石质材料刻写的语言文字，也包括以石质材料镌刻的画像、雕塑等，所有用石质材料作为承载信息、传递情感、表达思想的载体通称碑刻，这是从广义范围而言的。碑刻的定义主要包括三个要素：一是石质材料（玉是一种特殊的石质），二是刻写、雕镌手段，三是文字符号、图案、造像等文化信息。凡是符合这三个要素的都应该视为碑刻。

第二节 碑的形制

东汉是“碑”这种石刻正式定型的重要时期。碑一经定型，便在宫廷、庙宇、通衢、陵墓等广泛应用，并成为最主要的石刻类型。碑的外形大致可分为碑首、碑身、碑座（亦称碑趺）三部分。

汉碑的碑首与碑身大多连为一体，其底部插入碑座顶上的榫槽内，另有少数没有碑座者则直接插入土中。汉碑的碑首形状分为圆首、圭首（三角形尖顶）、平首（或称“齐首”、“方首”）三种样式。圭首碑就是上锐下方的尖

头碑，因形状与“玉圭”相似而得名。“玉圭”在古代视为通灵的礼器，被列为五瑞之一，是一种崇高的信物。周代筑坛祭祖时，就有将玉圭埋入坛下奉献给祖先的祭祀方法，早期墓碑、祭祀碑的碑首采用“圭”形，就是源于它具有的“通灵性”。汉碑中圭首碑有：

《郑固碑》、《鲁峻碑》、《鲜于璜碑》、《景君碑》、《白石神君碑》、《仓颉庙碑》等。“圆首碑”即指碑首为半圆形，通碑外形“上圆下方”，隐含着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如《肥致碑》。“平首碑”就是长方形石板，造型最为简朴，但在汉碑中数量不多见。



图6.《鲜于璜碑》（局部）。东汉延熹八年（165），1973年于天津武清县高村公社出土，现藏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为典型的圭首碑。

1. 碑额与碑身

碑首正中央部位称为“碑额”，其位置类似于人的额头，故名。上多用篆书题写碑名，故又称为“篆额”或称“额题”。额题文字书体除篆书外，尚有隶书、楷书、行书，草书极少见。

碑身正面称为“碑阳”，背面称为“碑阴”，两侧称“碑侧”，一般将靠近碑阳碑文首行的一侧称为“左侧”。碑阳刻写碑的正文，碑文逐字自上而下，逐行自右而左书写，亦有少数碑文逐行自左而右书写，我们称之为“左行”。碑文一般先用散文记事，后接韵文（三言、四言、五言、七言）赞颂。碑阴多刻门生故吏、撰书人、立石人姓名以及捐资建碑数额等。碑文如果过长，一般依顺时针沿碑阳、碑侧（右）、碑阴、碑侧（左）环刻碑文。少数碑阴另刻其他内容者，称为“后碑”。此外，汉碑还有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特征，即额题位置一般因势而就，不必强求居中。碑文亦有偏于碑身右侧，不求满布的情况，这些特点在后世碑刻中均十分少见。

东汉以前书碑人多为书佐小吏，鸿儒大家极少涉足，所以汉碑多不见书碑人姓名，存世汉碑中留有书碑人名姓者，仅见《武斑碑》之纪伯允、《华

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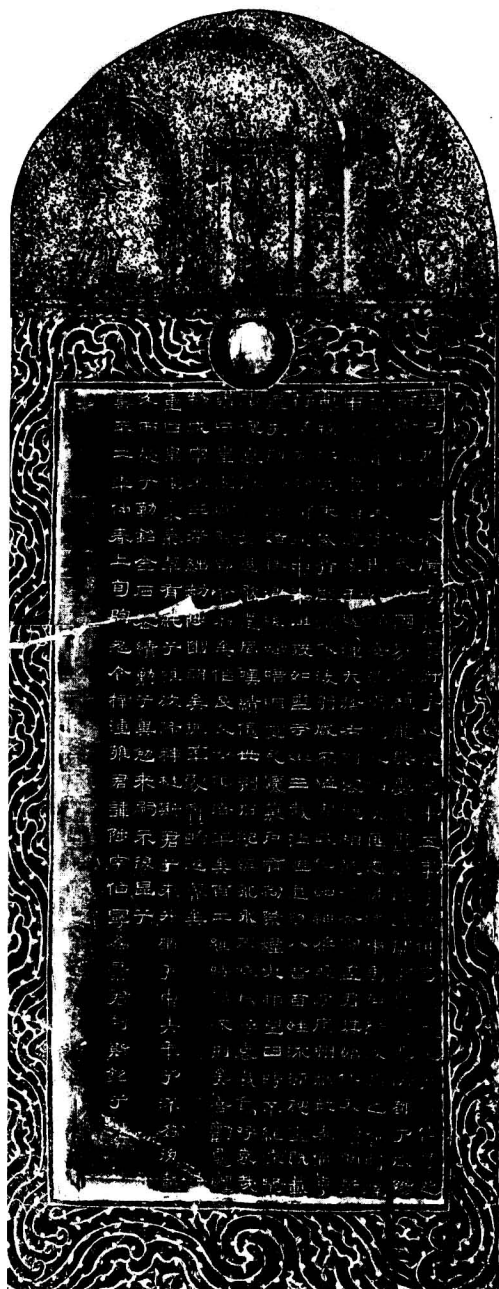


图7. 东汉熹平二年（173）《汉巴郡胸忍令景云碑》，2004年出土于重庆市云阳县，现藏三峡博物馆。其碑为典型的圆首碑，中间有穿。

山碑》之郭香察、《衡方碑》之朱登、《西狭颂》之仇靖、《郾阁颂》之仇绋。隋代以前书碑、刻碑一直被视为匠人之事，不受重视。唐代以后，世风一变，帝王将相、士族名流、学人诗客等纷纷加入撰写碑志、铭石书刻活动，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亲书《晋祠铭》、《温泉铭》等，帝有所好，下必从之。其后有武则天书写《升仙太子碑》，李隆基书写《石台孝经》、《纪泰山铭》等，又如76岁高龄的太子率更令欧阳询还奉敕书写《九成宫醴泉铭》，等等，书写碑文在观念上从一件苦差事转变为一项高雅而流芳百世的文化大事，从而也就逐渐形成了在碑志上加刻撰者、书者、刻工名姓的风气，为书法史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资料。

2. 碑穿与碑晕

汉代的碑刻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在碑额下方常凿有圆孔，直径在10厘米以上，称为“穿”。圆首碑“穿”四周一般还刻有三圈的弧形纹，称为“晕”，如《赵荊碑》、《营陵置社碑》、《孔宙碑》、《仙人唐公房碑》等。

为什么汉碑要有“穿”、有“晕”呢？有三种不同推测，第一种认为这是汉碑沿袭早期竖石葬俗，“碑穿”就是模仿下棺辘轳架上的圆孔，“碑晕”是模仿下棺引绳在“定滑轮”上摩擦痕，属于一种复古做法。第二种认为汉人深受“天人相应、天人一体”思想的影响，碑之圆首就象

征着天，而“碑穿”则意味着天上的日月，“晕纹”则象征为日月之光环。最后一种说法就是，墓碑的“穿”与“神主”相通，“神主”就是古代放在宗庙中逝者牌位，类似后世民间的灵位牌，“神主”一般木制，高一尺二寸，中间亦有孔。究竟哪种推测最正确，还是三种说法都有合理性，至今尚无定论。



图8. 东汉光和四年（181）《校官碑》。隶书碑额。

汉碑穿孔的位置高低、形状大小并不整齐划一，但一般多在碑额的额题之下，碑身的碑文之上，起到分界碑额与碑身的作用。亦有少数汉碑的“穿”在碑身正中，如《袁安碑》、《袁敞碑》等。魏晋以后，沿袭数百年的“穿”、“晕”古制逐渐废止，从此额题必求居中，碑文必求满布。随后在三圈弧形“晕纹”的基础上发展变形为蟠、螭等图案，晕纹本身转变成龙身，晕纹的两端雕刻出下垂的龙头，如建安十年（205）《樊敏碑》。汉碑碑额的纹饰得到较大的扩展，出现了“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仙人、祥瑞、神兽、珍禽等。如汉代的《鲜于璜碑》，碑额正面刻有青龙、白虎，背面刻有朱雀，碑座代替玄武，这样“四灵”齐全。南北朝时期碑额四灵中的青龙图案相继为蟠龙纹、蛟龙纹所替代，龙纹的出现，已经超越了祥瑞神异的含义，更成为皇权与地位的象征。

隋代以前的螭首碑，一般雕刻二条或四条螭龙，龙形瘦小简洁。到了唐代，正规重要碑刻的碑首均有六条浮雕



图9. 东汉建宁二年（169）《肥致碑》。碑无穿，但有深深的三道弧形“晕”。

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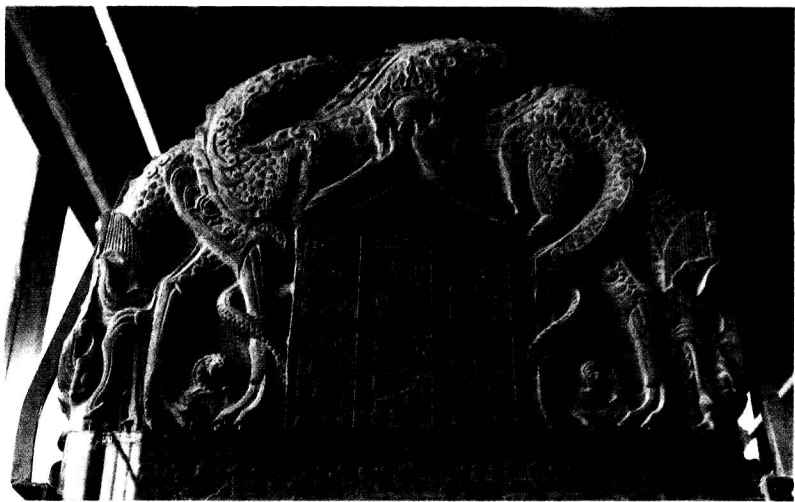


图10. 唐显庆三年（658）《道德寺碑》碑额，碑额雕有“摩尼如意宝珠”，为唐碑中比较常见式样。其碑额为主首形。

蟠螭，龙躯浑圆粗壮，腿爪强健有力，两爪在碑额正上方托起一枚宝珠，宝珠四周刻有火焰纹，或者宝珠下刻束腰莲座。此枚宝珠在佛教中称为“摩

尼如意宝珠”，是佛教的法物，佛经上说它是由佛陀的碎身舍利变化而来，能为人间施福，法力无边。因如意宝珠深藏大海，一直由龙王看护，故它也随着龙王一起被刻入碑首。

3. 碑座与螭趺

碑座又称之为“龟趺”。从形制上看，龟趺应该由玄武式样演变而来。关于驮碑的石龟，按神话传说是龙王的第九子，形似龟，好负重，名曰“螭趺”，亦名“霸下”。唐代以后，这种昂首凸目的龟趺成为最普遍的碑座形式，人们认为它力气大，寿命长，希望它能永远驮着碑石，流芳千古。此外，龟趺的底面积较大，能起到防止碑刻沉降的作用。汉代碑座多为方趺，不加雕饰，有的甚至没有碑座，直接插在土里。我们今天熟悉的龟形碑座出现的较晚，直到东汉光和六年（183）才出现在《白石神君碑》和《王舍人碑》的碑座造型上，后人称之为“龟趺”。唐碑碑座除“龟趺”外，还有“须弥座”和“方座”，这两种碑趺式样一般被与佛教有关的碑刻所采用。如柳公权书《大达法师玄秘塔碑》就是采用“须弥座”，史惟则隶书《大智禅师碑》则采用“方座”。唐碑在外形上较之汉魏六朝的碑要巨大得多，动辄四五米之高，因此唐碑的碑额与碑身只能分离为二，各自单独加工雕刻，然后拼装组合竖立。碑额较碑身略厚，还能起到防雨作用，减缓碑身刊刻文字风化剥蚀速度。此外，唐碑碑首范式中还演化出一种同时具有汉碑的圆首、圭首两种寓意的样式，圆首即指蟠螭浮雕在碑首外围，暗含天圆地方之意。圭首即缩化为尖头状的中央题额部分，带有通灵意愿，在一块碑上巧妙地将两种碑首寓意复合

碑

在一起。

隋唐以后，正式确立螭首、碑身、龟趺三部分的经典碑式，并为历代遵循。碑已经成为集书法、文学、绘画、雕刻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身的精美石刻艺术品。碑，除了普遍用作标识家墓、铭功颂德、纪事立言外，还被用来刻写经文、药方、书目、谱牒、地图、天文图等多种用途。碑的文物、史料、艺术价值逐渐得到后人重视，宋代还出现了西安碑林等专门收藏保护历代碑刻的机构，继而出现了针对金石碑版为研究对象的“金石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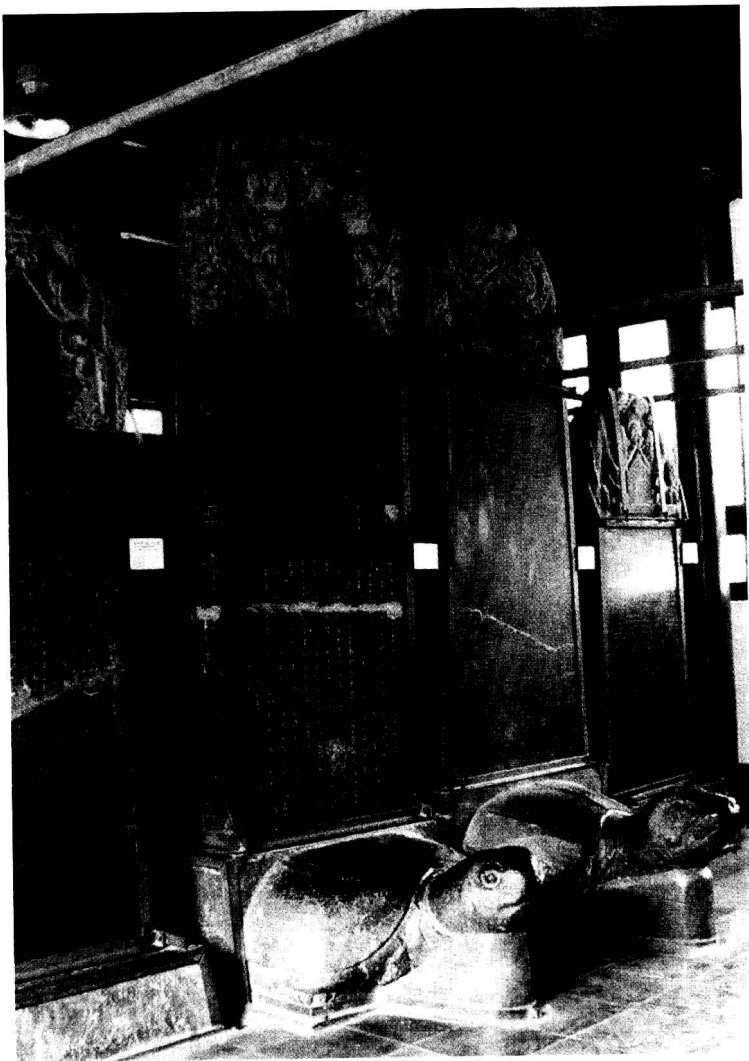


图11. 西安碑林陈列的“龟趺”式样的碑刻。其底座就是驮碑的石龟，俗称“赑屃”，好负重，人们认为它力气大，寿命长，希望它能永远驮着碑石，流芳千古。又因龟趺的底面积较大，客观上起到防止碑刻沉降倒伏的作用。

第三节 帖的起源

帖，《说文解字》上解释为文书卷子的标签，因为书写在帛上，所以“帖”字从“巾”部。后来“帖”又由“题签帛书文字”这一概念扩展为“小

帖